

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 状况的动态分析

李安山

内容提要 通过对传统目标国(地)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和南非华人人数和性别的动态统计,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洲华人的增长成为一种常态,在人口变化方面有三种表现,即华侨华人增长出现三次小高潮,华侨华人的性别比例逐渐平衡,老一辈华人中持有中国国籍者日益减少。近年来,尽管大量非洲华人返回中国,但在非华人人数的减少只是暂时的。目前,中非经济关系的基础有望从贸易转到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多方位合作,中非产能合作基础上的投资加强,中非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的促进,大部分非洲国家仍愿以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外资,因此,非洲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仍会持续增加。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非洲 华侨华人 移民人口 性别比例 国籍选择 身份认同

*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42)阶段性成果。笔者近年来访问非洲时,得到中国使馆和华侨华人的各种帮助。南非侨领拟海先生、尼日利亚侨领薛晓明先生、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李立先生、毛里求斯前部长曾繁兴先生、冯景广先生、华侨书报社黄导琪社长及各位侨领在本人2016年访问时提供帮助,颜先生(Maxim)专门驱车陪同本人祭拜华人墓地;中国驻留尼汪副总领事刘玉俐女士、留尼汪孔子学院管美玲院长和詹俏依老师为我的访问提供方便,山西大学外语学院要颖娟老师提供资料,华人历史学家黄素珍教授赠送书籍,侨领钟淑芳、侯沐凯和陈庆添先生提供拜谒关帝庙的机会,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一样,非洲华人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惊人的洞察力,取得了骄人业绩。他们在宗教、社会和文化方面以变化去适应新形势。^①华人的巨大成就和适时调整与其人口变化紧密相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的出现使“华侨华人”与“中国国际移民”的概念逐渐重合。尽管这种情况差强人意且存在定义问题,但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这一点难以改变。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使用“移民”这一概念。国际学术界近年来颇为关注在非洲的中国移民,有学者尝试对非洲中国移民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②有的试图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眼球。^③国内对非洲华侨华人数量也有探讨,但对华侨华人人口状况及其变化仍缺乏研究。^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1世纪这段时期,有多种因素对非洲华侨华人的增长至关重要。战后中国的两岸分治使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恶化,当时的移

① 有关非洲华侨华人的主要著作,参见 Leon M. S. Slawews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Connecticut: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71; Linda Human, *The Chines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Unisa Press, 1984; 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Editions de L'Océan Indien—Chinese Cathlic Mission, 1985;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Wong-Hee-Kam. Edith,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Paris; L'Harmattan, 1996;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 Huguette Ly Tio-Fane-Pineo and Edouard Lim Fat, *From Alien to Citiz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Mauritius*, Editions de L'Océan Indien, 2008; Marina Carter and James Ng Foong Kwong, *Abacus and Mah Jong: Sino-Mauritia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9; Yoon Park, *A Matter of Honour. Being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Lexington Books, 2009(此书已被译成中文,参见朴尹正:《荣誉至上:南非华人身份认同研究》,吕云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近期有关战后非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参见李安山:《试析二战以后非洲华人宗教意识的变迁与融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李安山:《二战后非洲华人社会生活的嬗变》,《西亚非洲》2017年第5期;李安山:《浅析战后非洲华侨华人文化生活的演变》,《八桂侨刊》2017年第3期;李安山:《试论非洲华人社团的传承与演变(1950—2016)》,《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

② Yoon Jung Park, “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 Occasional Paper, No.24, China in Africa Project, SAIHA, January 2009; Giles Mohan, Ben Lampert, May Tan-Mullins, and Daphne Chang, “Table 1. 1. Estimates of the Number of Chinese People in Selected African Countries,”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s Development—New Imperialists or Agents of Change?* London: Zed Books, 2014, pp. 4-5.

③ Howard W.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Knopf, 2014. 该书作者的中文名叫傅好文,这部书被《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推荐为2014年百本最佳图书。然而在该书第16页短短192个英文单词的一段有关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背景描述中竟出现八处错误。参见 Li Anshan, “Chinese Migration to Afric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Ute Rösenthaller and Alessandro Jedlowski, eds., *Mobility betwee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Economic Network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London: Zed Books, 2017.

④ 李新烽:《非洲华侨华人数量研究》,《华侨与华人》2012年第1—2期;李新烽:《试论非洲华侨华人数量》,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414/22/11567645_278300281.shtml, 2017-11-06。较早有关战后非洲华人研究的尝试参见李安山:《炎黄子孙在非洲》,《西亚非洲》2000年第1期。

民政策相对宽松；大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土改及其后来的运动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而移民国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开始放宽对移民国外的政策等，90 年代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为移民提供了好的机遇。这些因素形成了中国人移民国外的推力。与此同时，战后各殖民宗主国为摆脱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困境，均实行各种殖民地发展计划，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增加出口，以英国尤为突出。^① 这种政策无疑刺激了非洲殖民地的发展，形成了华侨移民非洲的拉力。移民人口变化包括诸多因素，例如年龄构成的变化，性别比例的变化，受教育人口的变化，职业的变化，等等。本文主要探讨非洲华侨华人总数的变化、性别比例的变化及国籍的变动。除已在非洲定居的华人的自然增长率之外，向非洲各地移民的华人可谓持续中有高潮，这主要与中国的政局及相关政策密切相连，亦与目标地的移民政策和政治局势相关。笔者力图从战后以来华侨华人移民非洲的三个阶段、传统目的地华侨华人的人口统计及其变化、21 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口估算及华侨华人性别及国籍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一、二战以来华人移民非洲的三个阶段

无论是从华侨华人的四个传统目标地（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和南非）还是整个非洲的华侨华人人口演变的情况看，战后以来，华侨华人移民非洲经历了三个较明显的阶段。20 世纪 50—60 年代是第一阶段，由于台湾的“先锋案”对台商在受援国定居经商起到某种推动作用，在几个传统目的地华人人口的数量增长较快；20 世纪 70—80 年代是第二波，台湾“先锋案”的影响继续发酵，受到国际社会孤立的南非以优惠的移民政策吸引了不少华商；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是第三阶段，大量中国“新移民”及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带来新的移民潮。

（一）1950—1960 年代：传统华人移民、四大华人企业与台湾“先锋案”

华侨华人人口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过程，这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等地比较明显。在马达加斯加，华人人口从 1941 年的

^① 张顺洪等：《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洲殖民化与香港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7—64 页。

3630人增加到1951年的4900人,到1961年达到8900人。^①葡属东非的贝拉港在1950年的统计时有华人663人,但到1954年警察局统计时,该地华人已达970余,如果将偏远地区的华人统计在内,人数已超过1000人,再加上洛伦索—马贵斯的华人,共有1700余人。^②留尼汪在1955年大约有5000多华人,^③到1967年,华人人数已达1.5万人。毛里求斯的华人移民也在这一时期大大增加。在1944—1952年这短短八年中,毛里求斯的华人增加了近7000人。从1952—1962年,华人新移民共有5000多人。^④南非的情况有些特殊,在1945—1952年间,从中国大陆移民南非的有346人;从1953—1962年的10年中,只有七人从中国移民南非;在1963—1973年间,有17人从中国移民南非。^⑤

一些华商看准商机,投资西非,最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四大华人企业。董氏家族在20世纪50年代末投资尼日利亚。董氏集团创始人董纪勋先生看到尼日利亚资源丰富,商机巨大,毅然从香港来到尼日利亚,靠投资搪瓷生意起家。经过三代人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奋斗,集团发展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实力,现已成为尼日利亚最大的华人企业之一。李氏集团的领头人李文龙跟随父亲于1960年代移民尼日利亚并创立西非格兰工业公司。经过集团不懈努力,李氏企业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集鞋制品、塑料袋及工业用食品包装,钢材、水泥、地产、运输、食品、羊皮、美容、商业数据服务与搪瓷器具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华亨集团于1963年落户尼日利亚,现已成为搪瓷业、电缆及建筑材料的最大制造企业之一。查济民是尼日利亚华人企业家。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浪潮,查氏集团看准时机,逐渐把香港的业务转向西非,在尼日利亚、加纳等国投资办厂。1964年,在卡杜纳建的统一尼日利亚纺织厂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在纺织业生产、管理和销售方面的第一次合作。

影响20世纪60年代非洲华侨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台湾在美国支持下向非洲提供农业技术援助的“先锋案”(Vanguard Project)。“先锋案”的

① 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202.

② 萧次尹:《非洲华侨经济》,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版,第74—76页。

③ 华侨问题研究会编:《华侨人口参考资料》,北京:华侨问题研究会1956年版,第140页,萧次尹根据当地华人的说法,再加上土生华人,认为共有0.6万—0.7万人,参见萧次尹:《非洲华侨经济》,第74—76页。

④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93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93年版,第923页。

⑤ 这些人都是获得永久居住权的华人。参见Karen L. Harris and Jan Ryan, “Chinese Immigration Australia and South Africa: A Comparative of Legislative Control,” in Elizabeth Sinn, ed.,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1998, pp. 382-383.

加快推行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状况和1960年9月新中国与几内亚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于11月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到几内亚的行动。“先锋案”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正如龙向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它是当时美国、台湾、非洲新兴国家三方利益交集和政治考量的一种呈现”。^①这一被称为“先锋案”的援助计划由美国精心策划并实施领导,台湾只是具体运作者,对此,刘晓鹏博士已有专文论及。^②从1961年开始,在美国的精心策划下,台湾希望通过在农业方面的援助来获得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支持。

“先锋案”历时14年,涵盖农、林、副、渔多个领域。虽然美国在1970年启动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计划,从而对“先锋案”的实施已是半心半意,但被蒙在鼓里的台湾当局对此项目十分投入,持续到1974年。项目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向非洲派遣各种技术队,如农耕队、技术队、种子中心、渔业队等;二是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技术人员。据统计,台湾向非洲25个国家派遣了39支各种技术队,包括23支农耕队、三支兽医队、一支酿造队、四支手工艺队、一支糖业队、一支油厂队、一支竹工队、一支渔业队、一个良种中心、一个机具制造厂、一个糖厂工程处和一个公路组等。^③根据1967年的统计,台湾派出农技团的23个国家中,有18个(含利比亚)是非洲国家(后来有所增加)。由台湾派出的援助人员包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513名农技专家,还有在利比亚的228名工程人员。到1970年,台湾在非洲的工作人数已超过800人。这个由美国政府出金钱、台湾当局出人力、非洲国家获援助的三赢计划——台湾获得非洲选票、非洲学习精耕技术、美国可由此安抚蒋介石的躁动并牵制共产党中国,其结果并不圆满。“至于解决非洲粮食问题,从来不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考虑。”^④

台湾于1961年11月28日最早向利比里亚派出农技团。受惠于“先锋案”的国家还有博茨瓦纳(1968年2月1日)、喀麦隆(1963年,1964年11月7

^① 龙向阳:《中国台湾与非洲的关系(1950—2016)》(未刊稿),第69页。有关台湾对非洲技术援助的系统研究,可参见王文隆:《外交下乡,农业出洋:中华民国农技援助非洲的实施和影响(1960—1974)》,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4年版。

^② 刘晓鹏:《从非洲维护美台联盟:从新检视“先锋案”》,《台湾史研究》2007年第14卷第2期,第161—181页。

^③ 引自龙向阳:《中国台湾与非洲的关系(1950—2016)》(即将出版),第70页。有关台湾向非洲诸国派出农耕队的消息,可参见〔南非〕《侨声报》1966年2月1日,1966年2月17日,1969年1月21日,1969年1月25日,1969年2月1日等相关报道。

^④ 刘晓鹏:《从非洲维护美台联盟:从新检视“先锋案”》,第164、178页。

日)、中非共和国(1968年11月13日)、乍得(1965年4月17日,1968年8月16日)、达荷美(即贝宁,1963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1963年8月21日)、加蓬(1963年10月23日)、冈比亚(1966年6月11日)、加纳(1968年11月1日)、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1963年3月15日,1968年4月2日)、莱索托(1969年1月24日)、利比亚(1962年3月4日)、马达加斯加(1966年12月20日,1969年4月15日)、马拉维(1965年12月24日)、毛里塔尼亚(1965年10月10日)、毛里求斯(1969年10月10日)、尼日尔(1964年7月27日)、卢旺达(1964年1月30日,1968年8月1日)、塞内加尔(1964年4月29日)、塞拉利昂(1964年6月15日)、斯威士兰(1969年9月23日)、多哥(1965年8月6日)、上沃尔特(即布基纳法索,1965年4月15日)、扎伊尔(即刚果金,1966年8月12日)等国。^①

上述国家在接受援助后,华侨人数迅速增加。有国家的华侨几乎全部由台湾派去,如利比亚等国。石油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和主要产业,20世纪50年代发现石油以来,石油开采发展很快,炼油工业迅速崛起。虽然利比亚资金充足,政府也有意发展,但缺乏人才。利比亚一方面鼓励教育,专家人才则从国外重金引进,以实施各方面计划。当时,台湾不断向该国派出各方面专家,包括医务、工程建设、港务、公路及民航各界。这里的工资及待遇远比其他地方好,年薪高者达3000利镑(约为8000余美元),最低的护士也有2500美元左右。随同抵达的眷属待遇也不错,利比亚负责交通和宿舍,每两年休假两个月。^②

台湾向非洲派送了不少技术人员,他们涉及多个领域。西非利比里亚的长期华侨只有三户。台湾“农复会”委员马葆之在利比里亚多年,担任该国农学院院长,还有在热带植物研究所工作的农业专家骆居骥博士等。1961年台湾派出第一支14人的农耕队抵达该国,队长邹梅因车祸回台湾。1975年,这里的华侨人数达到150人,这与农耕队有直接联系。台湾与喀麦隆的渔业技术合作始于1963年,当年渔业专家冯镛、钟玉麟和袁国成等曾到喀麦隆协助训练当地人的捕鱼作业。1964年10月31日,台湾又派出农耕队协助训练农业

^① “Sino-Afric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ttachment IV Technical Missions Sent to Africa A. Under Project ‘Vanguard,’ Agricultural Missions,” “Secretariat, Sino-Afric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Committee, Republic of China”, 1972, p. 71; *Technical Miss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frica and Other Areas*, “Secretariat Sino-Afric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Committee, Republic of China”, June 1969—1971.

^②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68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515页。

技术人员,收效颇佳。1966年增派专家四人,1967年又签订农业技术合作议定书,扩大援助规模,援助人员增至18人。加蓬也得到台湾的援助。当地华侨只有一人,1963年10月,台湾派出农耕队员12人协助加蓬发展农业,后增至15人,还担任训练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的任务,工作人员包括涂本玉、郭朝相、蔡翼飞、邓炳辉、童家锭、赖国栋等,其工作受到当地好评。^①

(二) 1970—1980年代:“先锋案”的牵引效果与南非的优惠政策

从后来华侨在多个非洲国家移民或投资情况看,不少非洲国家的华侨人数增长与台湾1960—1974年的“先锋案”有正相关关系。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台湾对25个非洲国家的农业技术援助推动了台商向非洲的移民趋势,从香港和东南亚一带移民非洲的华商也逐渐增多。台湾对非洲其他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农耕队的工作颇为上心。以“先锋案”最早受惠国利比亚为例,1968年,在利比亚工作的来自台湾侨胞已有数百人,台湾华侨在利比亚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有的期满后回台湾,也有人根据该国条件决定居留。1977年,利比亚的华侨有600人。^②最明显的是科特迪瓦,该国以前没有华侨,1963年起,台湾向当地派出农耕队18人,他们工作成绩优异,深得当地称赞,科方继续要求台湾提供援助。1967年,双方签订农业技术合作协定,台湾农耕队就地生产纯真优良种子供应各农耕队之需,再由台湾派遣专家16人前往科特迪瓦工作。1968年7月,台湾派驻科特迪瓦的农耕示范队已达100余人。农耕队队长是邹越欧,共分24个小组,每组六人,分布各区,以发挥普遍示范效应,深得当地民众欢迎。当时科特迪瓦的华侨已达146人。^③虽然1975年的华侨人数减少到80人,但1984年增至180人。华商经营的企业涵盖面较广。

表1的统计数据主要涉及20世纪80年代。可以看到,在科特迪瓦,由华人经营的工业企业有14家。与传统华人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以经商为主不同,这些企业设备新、规模大、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此外,投资者多为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华商。由于这些工厂多雇用当地工人,如范思尧的企业雇用当地工人

^①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68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514—515页。有关台湾农技援非的效率和成果,可参见刘晓鹏:《回顾一九六〇年中华民国农技外交》,《问题与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1—145页。

^②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77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77年版,第458页。

^③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68年》,第515页。

表1 科特迪瓦华人企业概况(1980年代)

(单位:美元)

代表者	主要经营业务	投资	备注
庄佑辅	电器制品	60万	Soleil公司,当地市场50%
李师曾等	塑胶及玻璃六家	450万	所产胶鞋和拖鞋占市场80%
沈台山	塑胶鞋、蚊香	150万	热心侨务,捐款助学
叶英敏	电扇厂、箱包	80万	也经营礼品杂货和西点面包
范思尧	搪瓷及白铁厂	250万	占当地金属制品业第21位
徐伟飞	针织厂、白铁	100万	占当地重要地位
台商与他人合作	尼龙纺织厂	1000万	为当地大企业之一
香港西非投资集团	搪瓷厂	68万	累积资本起超200万
同上	铁桶厂		年营业额超500万
台湾凤梨公司	凤梨罐头	160万	合资,凤梨公司10年出资60万
鱼翅加工厂	鱼翅加工	40万	外销为主,年营业额起0万
小型农具厂	农具制造	40万	产品占当地市场70%
电器厂	电器制造	不详	共两家

资料来源:本表为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参见陈怀东:《海外华人经济概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14—315页;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89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89年版,第712页。

600人,香港西非投资集团雇用1000余人本地员工,这些企业不仅成为华人经济的主要支柱,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刚果(金)的情况比较类似。1961年,这里的华侨只有八人,1966年有20余人;台湾派出农耕队后,1971年为39人;^①1975年,华侨为160人,1984年达到200人。加纳的华侨本来不多,1968年台湾农耕队到来后,华侨人数迅速增长,1975年达到300人,1984年为320人。^②加纳的纺织厂也是由台湾华商与当地人士合作,由台湾的技术员主持。^③尼日尔的农耕队员魏长五后来在当地经营金龙餐馆,“为当地经营最盛者”。^④多哥的华侨陈添六毕业于台湾大学,专攻农业,在美国纽约州立农业大学进修三年。他的公司资本额为200万美元,采取养殖业与种植业相结合的方式,从事农产品进口、经营农场及饭店,获

①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71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493页。

②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75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75年版,第458页;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76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76年版,第472页。

③ 陈怀东:《海外华人经济概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14页。

④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97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97年版,第931页。

利颇丰。他还创立了多哥中华商会并出任第一任会长。^① 在马达加斯加,华商陈坤与台商汪德焜合资于1971年创办中马搪瓷厂,资本360万美元,马达加斯加政府出资30%,经营管理全权委托给华商。^② 根据1989年的《华侨经济年鉴》,利比里亚的华人约120人,其中台湾移民约60人,其中萧瑞雄兄弟经营进出口业,投资100万美元。^③

1967年,南非在台北开设领事馆。1975年,台湾与南非签订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76年4月,南非驻台北总领事馆升级为大使馆。台湾由于失去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国际上颇为孤立,南非却因种族隔离政策而

表2 台湾商人在南非两个“黑人家园”的投资情况(1987)

姓名	投资地点	投资范围	备注
江义龙	特兰斯凯	印刷厂	
徐彰和	同上	三胜电子厂	
余新发	同上	三胜电子厂	
王明球	同上	打火机厂	
王东章	同上	免洗筷子厂	与日商合作,每日产量约为5000万余双,全部外销日本
欧忠义	西斯凯	餐具及厨具两家	
陈昌武	同上	针织工厂	
黄子建	同上	铜锁工厂	
欧思明	同上	雪衣工厂	
欧思亮	同上	运动鞋厂	
张卓然	同上	衬衫厂	
欧忠男	同上	橡胶鞋厂	
潘慧琦	同上	塑料袋厂	
韩香臣	同上	运动衫厂	
高鹏洲	同上	背心夹克成衣厂	
李政权	同上	手提式收录音厂	
宗成立	同上	成衣工厂	
张希嘉	同上	牛仔裤工厂	

资料来源: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华侨经济年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87年版,第622—623页;陆以正:《南非台资厂商知多少》,〔南非〕《彩虹商族》1997年1月1日创刊号。

- ①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89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89年版,第714页。
 ② 陈怀东:《海外华人经济概论》,第312页。
 ③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89年》,第714页。

受到国际社会制裁,双方处境相似。南非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低迷,国际制裁导致相当多的外资撤离,黑人大量失业使政局处于不稳定状态。为改善国内经济和政治状况,南非政府提出吸引外资的新政策,希望通过“黑人家园”的工业化,提供就业机会,以达到控制黑人向城市流动的目的,从而使政权更为稳固。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种族隔离制逐渐松动,南非鼓励投资移民的政策刺激了台湾的移民。根据南非官方资料,从1982年4月到1985年3月,台湾在南非“黑人家园”(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黑人划出的所谓“班图斯坦”)申请的投资项目有63个,总投资为9470万美元,创造就业机会1.6万多个。1988年,台商在南非拥有的工厂数目增至120家,投资额达12亿美元。^① 1986年9月,南非政府公布了对外商投资“班图斯坦”地区的优惠政策,主要有工资补贴、利息补贴、贷款融资和签证优惠,在南非各个地区出现了不少成功的华商。^② 此外,移民西非的华侨华人也在逐年增加,尼日利亚的第一位华人酋长朱南扬即是由香港到该地投资的华人移民,另一位曾任奥巴马总统顾问的胡介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来到尼日利亚的。

(三) 199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与香港新移民的涌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人移民非洲进入战后第三个阶段,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③ 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90年代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大型国企的改制使大批待业国人开始闯荡非洲;其次,一些香港居民担心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局势变化。当时,南非在香港移民心目中成为继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第四个理想的移民目标国。香港华人每年迁往南非的人数达1000户;再次,迁移的目的地(以南非为主)采取鼓励移民的政策。香港移民到非洲其他国家的偏多,非洲也成为台湾移民的优先选择之一。在1994年移民南非的869名华人中,台湾596人,大陆252人,香港21人。在1995年1—10月的350名华人移民人数中,台湾232人,大陆102人,香港16人。^④ 在非洲的华人新移民中,台商占很大比例,以1994年为例,南非的台商约7000余人,2003年已达1.2万人。科特迪瓦1994年底有华侨及侨商135人(不包括持有香港居留证、英国及东南亚国家护照的华人),其中100人系台商。2004

① 曾厚仁:《台商在斐投资回顾》,〔南非〕《彩虹商族》1997年1月1日创刊号。

②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479—491页。

③ 具体参见李安山:《试论世纪之交非洲华人经济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1990—2010)》(即将出版)。

④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419.

年,莱索托的华侨已达 6600 人,其中有一些是南非华侨的后裔,但相当部分来自台湾,而且是投资的领军性人物。此外,马拉维、加纳、尼日利亚、利比里亚等地的台湾华商也都有一定规模。^①

到 21 世纪,台湾在非洲的移民继续增长。2003 年,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南非的华侨华人约为 4.5 万人,其中台湾华商为 1.5 万人。关于台湾移民在非洲特别是南非的投资情况,将在下面章节分析。在南部非洲小国斯威士兰与莱索托,2003 年的数据表明,这里的台商相当多。莱索托的华侨华人达 6600 人,台湾投资者为 600 人左右;斯威士兰的华侨华人为 1700 人,台湾来的约为 200 人。^② 这两个小国有众多华侨华人,一方面是台湾 20 世纪 60 年代的农耕队打下了基础,从而不仅使台湾各界知道了这两个国家,一些农耕队成员很有可能重新回到这两个国家居留或投资。当然,南非从 1980 年代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对这两国华侨人数的增加应有某种刺激作用。马达加斯加盛产无色刚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马岛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华商以各种方式参与矿业开采。泰国的华商到马达加斯加采购无色刚玉运回泰国加热处理成蓝宝石,带动了马岛华侨矿业的发展。当然,来自大陆的华侨华人占的比例更大,他们以非洲为舞台,积极参与这个大陆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后文将详细论及)。

以上移民史表明,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人口构成也呈现出不同成分。20 世纪 50—60 年代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商,70—80 年代台湾移民比较突出,90 年代以来大陆新移民异军突起。战后这些中国移民分布范围更广,包括西非、北非和东非。由于国际社会对南非实施的禁运等制裁措施,南非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因而与莱索托、斯威士兰、博茨瓦纳等国吸引了较多移民,特别是台湾的投资移民,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多的大陆移民。由于这些移民中有一定比例的高素质人才,因而在较短时间内即开始推动当地经济。

二、传统目的地华人人口的统计与动态分析

华侨华人传统的目的地即早期华人较多的几个非洲国家(地区)主要包括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和留尼汪岛。

^① 参见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华侨经济年鉴》(1991—1995 年)。

^②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华侨经济年鉴欧非篇 2002—2003 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 2004 年版,第 240—241、249—252、259—261 页。

(一) 毛里求斯的华人人口统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里求斯华人增长很快。从1944—1952年这短短八年中,毛里求斯的华人增加了近7000人,从1952—1962年,华人新移民共有5000多人,华侨人数从1972年以后持续增加。根据1987年底的侨情调查资料,当时毛里求斯华侨人数已达3.07万人。1993年,根据华侨的自然增长率,华侨人数应该已达到3.7万余人。再加上香港、东南亚的华侨投资商人和台商,以及当地聘请的各类制造业和经营管理技术人员,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毛里求斯华侨人数估计已达到3.8万人。^①

表3 毛里求斯华人人口统计(1944—1996)^②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44	9701	1972	22817
1952	16459	1975	27400
1957	21157 *	1987	30700
1961	23266 *	1990	30700
1962	21641	1993	38000
1970	25000	1996	40000

资料来源: 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114;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566—567页;《华侨经济年鉴》(台北)历年统计数据。

21世纪以来,毛里求斯华裔青年移民海外的人数不断增加,主要有以下原因。毛里求斯是双语制国家,英语、法语通用,华裔青年掌握这两种语言,有的还会中文,其语言能力超过他人,在国外找到工作的机会较多。他们中的佼佼者能获得去英联邦国家留学的奖学金,深造后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强。国际上对人才的竞争十分明显,这种大环境造就了他们在世界舞台大展身手的机会。一方面,不少华裔青年从毛里求斯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不少中国人陆续移民这个美丽岛国。有的国人选择了自己的如意郎君,远嫁毛里求斯,有的认定了毛岛这个理想之地,决意在此开创自己的事业天地。根据台湾“侨务委员会”的统计,2003年,毛里求斯的华侨仍然保持着三万余人这个规模。^③近年来,青年

①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93年》,第923页。

② 这一表格的数字与毛里求斯《周末报》上的文章所列出的数字有出入。参见《毛里求斯华人简史》,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③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华侨经济年鉴 欧非篇 2002—2003年》,第287页。

华裔的离开使人口下降较多。

(二) 马达加斯加华人人口统计

在马达加斯加,1941年的华人人口为3630人,到1951年增加到4900人,随后有一个飞跃,到1961年达到8900人,在经历独立后几年的徘徊后,华侨人口从1964年保持持续上升。1968年,马达加斯加的华侨人口统计数为8489人,但由于有大量的华人—马尔加什人的混血家庭人口,因此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混血华裔,有学者估计华侨有1.5万人,这应该是将混血华裔统计在内。^①然而,由于马达加斯加在一段时期内政局动荡,加上1975年曾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华侨曾一度撤离这个国家。不过,由于马达加斯加发展潜力巨大,生物多样性高居世界前列,物产丰富,劳动力充足,华侨又不断从外涌进。华侨人口从1965年的9008人到1996年的2.7万人,增加了两倍。2003年,马达加斯加的华侨仍然保持在2万多人。^②这些新移民多来自三方面:一是中国大陆的移民,他们多开拓小商业或餐馆,对沟通中国—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商业贸易起到重要作用;二是台湾迁移过去的企业家;三是由香港、新加坡和毛里求斯等地过去投资办厂的华商。

表4 马达加斯加华人人口统计表(1941—1996年)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41	3637	1959	8032	1963	8066	1975	11500
1951	4900	1960	8900	1964	8045	1984	13600
1957	7349	1961	8901	1965	9008	1990	14500
1958	7428	1962	8519	1966	9203	1996	27000

资料来源:Slawews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pp. 52, 55; Hugg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202;《华侨经济年鉴》等相关资料。

(三) 留尼汪华人人口统计

1955年,留尼汪有5000多华人,^③根据1955年台湾驻约翰内斯堡领事馆统计,留尼汪华人人数为3800人,这种统计大概未将华裔计算在内。根据《华

①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69年》,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474页。

②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辑:《华侨经济年鉴 欧非篇 2002—2003年》,第289页。

③ 华侨问题研究会编:《华侨人口参考资料》,第140页。

侨经济年鉴 1958年》，留尼汪中华总商会估计，华人人数为 4000 人，如包括土生土长华侨，约在 6000—7000 人之间。1967 年，华人人数已达 1.5 万人。1975 年，留尼汪华人增至 1.2 万人，其中 5000 人为华裔或取得当地国籍者，包括不少克里奥尔人。^① 1987 年统计表明，留尼汪的华侨、华人和华裔共 1.34 万人，其中 40% 是华裔。随着留尼汪与香港、东南亚、台湾和大陆经贸关系的加强，相当多的华商从这些地区涌向留尼汪，投资者与新移民促使当地华侨人口增加，到 1993 年，当地华人估计人数已达 1.7 万人。^② 2003 年，留尼汪的华侨已达 2 万余人。^③

表 5 留尼汪华人人口统计表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47	2229	1975	12000
1954	2820	1984	13400
1955	3800	1987	13400
1958	4000	1990	13400
1962	6628	1993	17000
1967	15000	1996	25000
1973	15000	2003	20000

资料来源：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 26—27 页；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164；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 565—566 页；《华侨经济年鉴》相关年份报告。

1950 年，英属塞舌尔人口普查时，华侨人口为 81 人，华裔有 213 人，其中多数为华人-克里奥尔人混血，该国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陈文咸即为混血华裔。实际上，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也有大量的华人-克里奥尔人混血家庭。

(四) 南非华人人口统计

从 1945—1952 年，从中国大陆移民南非的有 346 人。从 1953—1962 年的十年中，只有七人从中国移民南非。1963—1973 年间，17 人从中国移民南非，在 1974 年这一年，有 49 名中国移民。从 1976 年起，对华人移民的统计开始分

①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 1975 年》，第 469 页。

②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 1993 年》，第 925 页。

③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辑：《华侨经济年鉴 欧非篇 2002—2003 年》，第 288 页。

为大陆、台湾和香港三种。^①

表 6 南非华侨华人人口统计表(1946—2000)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46	4340	1976	9000	1991	25000
1954	7000	1981	8500	1994	26000
1955	5163	1986	9710	1995	27515
1959	5105	1987	10000	1996	28000
1966	8000	1988	11000	2007	200000—400000
1972	8700	1989	15000		
1973	8800	1990	20000		

资料来源: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第563页;Yoon Jung Park, “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 Occasional Paper, No.24, China in Africa Project, SAIHA, January 2009, p. 4。

表 7 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南非华人移民(1961—1995)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61—1975	69	1986	7
1976	2	1987	133
1977	1	1988	301
1978	4	1989	483
1979	3	1990	1422
1980	4	1991	1981
1981	1	1992	275
1982	2	1993	1971
1983	—	1994	869
1984	4	1995年1—10月	350
1985	1	共计	7883

资料来源: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 419。这与凯伦·哈里斯(Karen Harris)文中所谈及的数字略有不同。Karen L. Harris and Jan Ryan, “Chinese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and South Af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egislative Control,” in Elizabeth Sinn, ed.,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p. 382。

^① 这些人都是获得永久居住权的华人。Karen L. Harris and Jan Ryan, “Chinese Immigration Australia and South Africa: A comparative of Legislative Control,” in Elizabeth Sinn, ed.,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pp. 382-383。

从1976—1979年,抵达南非共和国的台湾移民只有12人,在1980—1989年间,移民南非的台湾人达935人。在1990年一年内,1422名南非华人移民全都是从台湾去的。至于到南非做生意的台湾人,则数目更大。从1995年开始,大陆华人移民南非的逐渐增多。2003年,南非的华侨华人已达4.5万人,台湾移民约1.2万人,其中在南非国会有四位华人议员,代表华人族群的利益。^①1987年,南非政府给予华侨的永久居留权突然增加,这是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制裁的结果,特别是美国加入制裁使南非在国际上相当孤立,它需要用各种手段来吸引移民特别是投资者。另一个原因是南非政府蓄意制造的“黑人家园”的各种优惠政策开始吸引外来投资者,台湾企业家看准了这一机会。^②

三、21世纪非洲华侨华人口估算

这里之所以用“估算”,而不用“统计”,是因为人口统计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标准和机构。何为“华侨”?何为“华人”?目前,中国往往将“华侨”和“华人”连在一起使用。掌管华侨华人事务的机构单位有五家,形成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局面。非洲相关国家似乎也没有相应的机制,南非的体制相对完善,但仅限于对取得南非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华人人数的准确统计。对于远远大于这一类人的“华侨华人”,实在无法确定相应标准。笔者认为,在确立标准之前,对华侨华人的统计不可能准确。

(一) 关于非洲华侨华人人数的历年估计

非洲华侨华人数为并不多,但21世纪以来增长很快。1996年,非洲的华侨华人只有约13.6万人。^③笔者当时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需开拓新的市场,非洲发展具有巨大潜力,东亚快速发展及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国树立的吃苦耐劳的形象,欧美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和非洲国家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这些因素将促使中国人走向非洲,中国人移民非洲将形成势头。^④2002

①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辑:《华侨经济年鉴 欧非篇 2002—2003年》,第237—248页。

②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 1990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89年版,第982页。

③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附录六:非洲国家(地区)华侨华人人数量统计表(五)非洲国家(地区)华侨华人的分布,第568—569页。

④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513—514页。

年,非洲华侨华人是 25 万人,^①2006—2007 年为 55 万人。^② 根据新华社报道,2007 年,高达 75 万中国人在非洲“超期”居住或工作。^③ 2009 年,非洲华侨华人的估计数为 58—82 万人之间。^④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李新峰认为,非洲华侨华人的数字在 2012 年达到 110 万。^⑤ 从他的这一估算数字看,非洲华侨华人人数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9 倍。^⑥

李新峰认为,非洲华侨华人人数统计有三难(概念界定难,数量统计难和管理组织难)。他的推测逻辑清晰。然而,这一估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定义不清,我们难以得出华侨华人的准确数字,当然这牵涉到更为复杂的原因;^⑦其次,未能区别世界移民研究中的移民、流动劳工和学术意义上的侨民等概念,以他所列出的华侨华人最多的三国(南非、安哥拉和尼日利亚)而言,中国移民虽然很多,但永久居留者并不多,已成为当地公民的华人人数更少。这种计量数字的庞大主要是因为在当地短暂居留或承担各种建筑项目(机场项目、社会住房项目等)的中国建筑工人占绝大多数。这些人难以用华侨华人来定义。例如,安哥拉的华侨华人数字为 26 万人。由于这一数字包括了大量的参与项目的建筑工人,自 2015 年安哥拉货币贬值以来,有的工程停止,有人因治安情况恶化而放弃在当地谋生的机会,40%—50% 的中国人返回中国。^⑧ 那么,是否仍将他们算作华侨华人呢?再次是个别地方缺失,如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东距非洲西海岸约 130 公里,东北距西班牙 1100 公里。根据大加那利群岛华侨华人协会副会长周俊杰介绍,目前该岛有华人经营的餐馆一百多家,共有华人一万

① 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 页。

② 王望波、庄国土编著:《2008 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 页;李鹏涛:《中非关系的发展与非洲中国新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③ Giles Mohan, et al.,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New Imperialists or Agents of Change*, p. 3; 吴晓琪:《一百万中国人在非洲摸爬滚打》,http://data.163.com/12/1017/01/8DVTB39G00014MTN.html,2015-09-15。

④ Yoon Jung Park, "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 *Occasional Paper*, No.24, January 2009.

⑤ 李新峰:《非洲华侨华人数量研究》,第 7—12 页;李新峰:《试论非洲华侨华人数量》,http://iwaas.cass.cn/dtxw/fzdt/2013-02-05/2513.shtml,2017-11-06。

⑥ 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1990 年华侨数字为 2529.5 万,非洲华侨为 9.9 万;2000 年的华侨总数和非洲华侨数分别为 3504.5 万和 13.7 万;2009 年两者的数字分别为 3946.3 万和 23.8 万。Peter S. Li and Eva Xiaoling Li, "The Chinese Overseas Population," in Tan Chee-Beng,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Routledge, 2013, Table 1.1, p. 20.

⑦ 李安山:《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以非洲为例》,《西亚非洲》2016 年第 1 期,第 76—97 页。

⑧ 2017 年 01 月 25 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卡罗斯·奥亚(Carlos Oya)致笔者的电子邮件。

人左右。^①

如前所述,一些国际学者也对非洲的中国移民进行了估计。例如,韩裔美国学者朴尹正经过估算,认为非洲的华人移民为58.305万—82.005万人。^②英国开放大学莫汉等人的研究则列出历年各种相关资料显示的华人移民较多的15个非洲国家(地区),即毛里求斯、安哥拉、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埃塞俄比亚、留尼汪、莫桑比克、喀麦隆、尼日利亚、埃及、苏丹、加纳、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③

(二) 对有关非洲华侨华人估计数字的质疑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对华侨华人人数的统计一直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如果不确定华侨华人的标准,这种统计在学理上没有意义,也不会准确。^④

2017年1月19日,一家有关非洲事务的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很有意思:《20个中国移民最多的非洲国家:为什么这些数据有问题》。该作者谈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汉娜·波斯托尔(Hannah Postel)正在进行的一项有关非洲国家的中国移民人数的调查,已完成了一个未公开的移民许可数据库,对2.5万多个移民许可信息进行分析。项目负责人波斯托尔指出,赞比亚的中国移民数据一般认为是八万人,这是赞比亚前总统萨塔在2006年首次竞选总统时敲定的。然而,经过调查的数据远远低于此数,2014年只有1.3万(最多至2.3万人)。她的这一大致估计也被赞比亚内部事务部副部长于2015年的估计数(两万人)所证实。这种大大膨胀的数据容易使人产生某种恐惧,如担心中国移民正在“非洲构建一个新帝国”。她认为,虽然非洲的中国移民在过去10年内有所增长,但有关中国移民的估计从25万到200万不等,所有这些估计都只是“信息的猜测”(informed guesses)。^⑤

本文列出的非洲中国移民最多的20个国家的数据如下:

① 《探访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华人一族:繁荣岛上旅游业》,2009年2月11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25/10/2064683_262285143.shtml, 2017-02-02。

② Yoon Jung Park, "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 p. 4.

③ Giles Mohan, et al.,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New Imperialists or Agents of Change?* pp. 4-5.

④ 李安山等:《双重国籍问题与海外侨胞权益保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⑤ 关于波斯托尔的近期研究,参见 Hannah Postel, "Moving Beyond 'China in Africa': Insights from Zambian Immigration Dat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46, Issue 2, 2017, pp. 155-174.

表 8 非洲国家的中国移民数量估算表

(单位:万个)

	国家	中国移民数量 (万)	年份	信息来源
1	南非	35	2009	《犹太人:表达、认同和抗议》(Simon J. Bronner, <i>Jewishness: Expression,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i> , Oxford · Portland, Oregon, 2008)
2	安哥拉	25.9	2012	安哥拉 Visao 网站
3	马达加斯加	7—10	2011	《非洲评论》(<i>African Review</i>)
4	埃塞俄比亚	2—6	2014—2016	荷兰 Science Direct 全文数据库, 南非“非洲新闻频道”(eNEWS Channel Africa, ENCA)
5	毛里求斯	3.85	2010	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aprtment)
6	阿尔及利亚	3.5	2009	路透社(Reuters)
7	坦桑尼亚	3	2013	〔坦桑尼亚〕《每日新闻报》(<i>Daily News</i>)
8	留尼汪	2.5	1999	汉语教育基金(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al Foundation)
9	刚果共和国	1.5—2.5	2013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杂志》(<i>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i>)
10	尼日利亚	2	2012	《中国日报》(<i>China Daily</i>)
11	加纳	0.6—2	2010	“Drivers of change or cut-throat competitors? Challenging Cultures of Innovation of Chinese and Nigerian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West Africa,” p. 10/Wikipedia(维基百科)
12	赞比亚	1.9845	2014	《赞比亚每日邮报》(<i>Zambia Daily Mail</i>)
13	莫桑比克	1.2	2007	国际关系与安全网络(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Network)
14	津巴布韦	1	2016	〔津巴布韦〕《纪事报》(<i>Chronicle</i>)
15	埃及	0.6—1	2007	《非洲研究评论》(<i>African Studies Review</i>)
16	苏丹	0.5—1	2005—2007	《非洲研究评论》(<i>African Studies Review</i>)
17	肯尼亚	0.7	2013	〔肯尼亚〕《商业日报》(<i>Business Daily</i>)
18	乌干达	0.7	2007	〔乌干达〕《新景报》(<i>New Vision</i>)
19	博茨瓦纳	0.5—0.6	2009	法国 24 电视台(France24)
20	莱索托	0.5	2011	“Chinese Engagement in Lesotho and Potential Areas for Cooperation”/Wikileaks(维基解密)

资料来源: Dana Sanchez, “20 African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Chinese Migrants, And Why These Statistics Are Problematic,” AFKI Original, January 19, 2017, http://afkinsider.com/137127/20-african-countries-with-the-most-chinese-migrants/#_sthash.okuJ8kMa.dpuf, 2017-02-02。

由于正式报告尚未公布,笔者在此不想对此篇文章披露的内容进行过多评论,只想说明三点:第一,这一报告的重要性不可低估,特别在正确评价中非关系的今天;第二,学界目前对非洲的中国移民的估计很不精确;第三,学术的公正性在于对事物的客观分析,只有不带偏见、公正客观的研究才能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公共产品。

为了更好地揭示非洲华侨华人的变化情况,笔者附上1968—2017年各种对非洲华侨华人的估算或统计。(参见表9)

表9 非洲国家(地区)华侨华人人数统计表(1968—2017)

国家(地区)	1968	1975	1984	1990	1996 ^①	2001 ^②	2003	2004—2017 ^③
阿尔及利亚					200	2000		20000
安哥拉	500	550	250	250	300	500		20000—40000
贝宁	32				100			4000
博茨瓦纳		25	45	25	300	40		3000—10000
布基纳法索							20余	1000
布隆迪								150
中非								300 ^④
吉布提								无具体数字 ^⑤
赤道几内亚					388			300 ^⑥
喀麦隆	18 ^⑦	10	10	10	407	50		1000—7000
佛得角					50			2000
乍得	20						14	300—500

① 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568—569页。根据台湾华侨协会总会的统计,1998年非洲华侨总数为12.6万人,(台湾)《侨协杂志》1999年总第65期,第76页。

② Ohio University Data Base of overseas Chinese, 2001, <https://cicdatabank.library.ohiou.edu/opac/population.php>, 2017-11-06.

③ Yoon Jung Park, “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 Occasional Paper No.24, 2009; 2009—2017年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网络和笔者与相关人员的通讯,“无具体数字”系从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报道中的推论。

④ 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孙海潮于2012年12月29日提供。参见《中国侨民大部分已安全撤离中非共和国》,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2-12/30/c_124167238.htm, 2017-02-02。

⑤ 《吉布提人的中国形象您好! China Good》, <http://www.anfone.net/mil/ZJBTZGRYDS/2017-3/5069517.html>。

⑥ 《驻赤道几内亚使馆举办2016年春节招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gq.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505/20050500096374.html>。

⑦ 长期居留的老华侨为三人,其余为台湾派驻农耕队队员15人。

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

(续表)

国家 (地区)	1968	1975	1984	1990	1996	2001	2003	2004—2017
科摩罗								无具体数字 ^①
刚果(布)	1	1			142			7000
刚果(金)	25	160	200	200	200	200		500—10000
科特迪瓦	146	80	180	200	1300	200	35	10000
埃及	20	30	110	110	100	110	2000	6000—10000
厄立特里亚								无具体数字 ^②
埃塞俄比亚	55	60	50	55	55	100		3000—5000
冈比亚	15				150		11	无具体数字 ^③
加纳	100	320	320	320	700	500	40 余	6000
加蓬	16 ^④				30			6000
几内亚					10			5000—8000
几内亚比绍					60			无具体数字 ^⑤
肯尼亚	150	160	145	150	150	190		7000+
莱索托		30	200	500	450	1000	6600	5000
利比里亚	20 ^⑥	150	120	120	120	120		600
利比亚	260	2000	356	356	400	500		3000
卢旺达	15							无具体数字 ^⑦
马达加斯加	8489	11500	13600	14500	27,000	30000	2 万余	60000
马拉维	38 ^⑧	50	33	50	40	40	70 余	2000
马里								3000—4000

① 《驻科摩罗使馆举行 2016 年春节招待会》，2016 年 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wbdt673032/jghd673046/t1339515.shtml>。

② 根据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官员提供的信息，2017 年 4 月 6 日。

③ 《驻冈比亚使馆举行 2017 年新春招待会》，2017 年 2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wbdt673032/jghd673046/t1437743.shtml>，2017-11-06。

④ 除一人为老侨外，其余均为台湾派驻农耕队队员。

⑤ 《驻几内亚比绍使馆举行 2015 年春节招待会》，2015 年 2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wbdt673032/jghd673046/t1238518.shtml>，2017-11-06。

⑥ 除长期在此居留的三家华侨外，主要为台湾派往该国的农耕队队员，约有 14 人。

⑦ Mary Kay Magistad, “Chinese in Rwanda,” *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 October 17, 2011, <https://www.pri.org/stories/2011-10-17/chinese-rwanda>。

⑧ 仅有两人为老华侨，其余为台湾派往该国的农耕队队员 36 人。

(续表)

国家 (地区)	1968	1975	1984	1990	1996	2001	2003	2004—2017
毛里塔里亚								无具体数字 ^①
毛里求斯	23300	27400	30716	30700	40000	40000	30000	30000+
摩洛哥	15	15	20	20	20			无具体数字 ^②
莫桑比克	3500	5000	650	200	600	700		1500
纳米比亚								5000(40000)
尼日尔	15	15	15	15	22			1000
尼日利亚	1	500	1500	1500	5100	2000		100000
塞内加尔					10		500	2000
塞舌尔		300	650	650	2000			1000 ^③
塞拉利昂	10	20	25	20	20	20		400—500
南非	8000	9000	8850	20000	28000	30000	45000	100000—400000
南苏丹								无具体数字 ^④
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100		8	100+ ^⑤
索马里								无具体数字 ^⑥
苏丹					45	45		20000—74000
斯威士兰			80	90	200	90	1700	300
坦桑尼亚	350	450	500	510	510	600		3000—20000
多哥					112	50		3000
突尼斯								2000
乌干达	75	80	80	80	80	100		5000—10000
赞比亚	70			30	40	150		4000—6000 (40000)
津巴布韦	300	660	250		500	300		5300—10000

① 《驻毛里塔尼亚使馆举行2017年春节招待会》，2017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wbdt_673032/jghd_673046/t1433434.shtml, 2017-11-06。

② 《驻摩洛哥大使孙树忠举行2016年“欢乐春节”招待会》，2016年2月2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wbdt_674895/t1337231.shtml, 2017-11-06。

③ 《塞舌尔华人》，2013年5月17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517/15/11567645_286113849.shtml, 2017-11-06。

④ 《驻南苏丹使馆举行2017年春节招待会》，2017年1月29日。

⑤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华人》，2013年5月16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516/21/11567645_285941245.shtml, 2017-11-06。

⑥ 《驻索马里使馆温馨提示》，2014年11月5日，<http://so.chineseembassy.org/chn/lsfw/fsxz/t1428891.htm>, 2017-11-06。

(续表)

国家 (地区)	1968	1975	1984	1990	1996	2001	2003	2004—2017
留尼汪	3000 ^①	12000	13400	13400	25000	20000	20000+	25000
加那利群岛					300			10000 ^②
共计	50000				136000	129605		583050—820050 ^③

资料来源：台湾“侨务委员会”（“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Taiwan）：《华侨经济年鉴》（1968,1975,1984,1990,2003年）。2003年有些为华侨总数，如埃及、莱索托（2004年）、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南非、留尼汪、塞内加尔、斯威士兰等国，其余为台商数。波斯托尔（Hannah Postel）正在进行的一项专门调查表明，有关非洲的中国移民的估计数字大多数明显有夸大之嫌，从而误导了社会。作者列出了南非、安哥拉、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留尼汪、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加纳、赞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埃及、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博茨瓦纳、莱索托等20个国家的最新估计数。Dana Sanchez, “20 African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Chinese Migrants,” January 10, 2017, <http://afkinsider.com/137127/20-african-countries-with-the-most-chinese-migrants/#sthash.okuJ8kMa.dpuf>, 2017-11-06。

（三）关于非洲华侨华人快速增长的说明

不可否认，非洲华侨华人人数从19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很快，但有三点不容置疑。首先，相对于华侨华人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分布，非洲华侨华人的数目很小。如果从国家分布数看，即使是华侨华人在非洲有100万人，他们在每个国家大约平均只有两万人，这个数字无法与在美国或加拿大华侨华人（150万）相比；其次，中国移民与其他国家在非洲的移民数字也无法相比，截至2015年初，南非的印度侨民已达155万。^④2011年，南非政府的人口统计表明南非的英国人达160万；^⑤再次，这些所谓的中国移民中，入籍非洲国家的人极少。以南非和安哥拉两个中国移民最多的国家为例，申请南非国籍并获批的华人很少，^⑥在安哥拉经商的中国人中约

① 如果将混血华裔包括在内，华侨人数多达1万人以上，华侨中存在1.5万人的说法。

② 《探访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华人一族：繁荣岛上旅游业》，2009年2月11日。<http://www.chinaneews.com/hr/ozhrxw/news/2009/02-11/1559044.shtml>, 2017-11-06。

③ 此为朴尹正（Yoon Jung Park）的数字，未包括此栏中本人收集的诸国2009—2017年的人数。

④ “Population of Overseas Indians.”参见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网站的统计，http://moia.gov.in/writeraddata/pdf/Population_Overseas_Indian.pdf, 2015-09-14。

⑤ “Census 2011, Census Brie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diaspora_in_Africa, 2015-09-14。

⑥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510.

87%表示他们肯定要回中国,①其他国家也如此。②

四、华侨人口统计中的性别比例

(一) 早期华人移民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衡问题

性别不平衡一直是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早期青年男性往往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近代苦力是中国移民的重要部分。欧洲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其将目光盯上中国劳工,遂有“猪仔”贸易(一般认为典型的“猪仔贸易”始于1845年,终于1871年)的出现。一些当时从事苦力贸易的欧洲商人担心如果没有妇女随行,“猪仔”贸易即会停止,高额利润无法获得。认识到劳工的稳定性与妇女的相伴有直接关系,洋务买办想尽办法将“猪仔”长期束缚在他们的种植园或矿山里,诱使“猪花”一同出洋,办法是给“猪仔”提供一笔钱去购买女子,结为夫妇。因此,出现了买办走私妇女出洋的现象,俗称“猪花”。③ 殖民官员认为契约劳工主要从事体力活动,初期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青年男性苦力身上,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单一男性世界会产生诸多社会弊病,如治安、道德等问题,况且,纯粹男性劳动力的社会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毛里求斯殖民总督收到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妇女移民问题是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问题”,禁止妇女移民不可取,购买大批妇女劳力不可能,“女性移民(原文为大写)似乎是一种道义的必然”。④

后来,欧洲殖民列强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以合法手段招募契约华工。由于

① Terence McNamee, et al., *Africa in Their Words: A Study of Chinese Traders in South Africa, Lesotho, Botswana, Zambia and Angola*. 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 2012/2013, pp. 36, 42;高欣等:《中国人在非洲》,《法治周刊》2013年4月23日,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2568,2015-09-10。

② 例如,2011年2月从利比亚撤出的35860名中国人中,绝大部分是中资公司的工程承包人员。外国学者的调研也得出类似印象,参见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pp. 68, 70, 114, 195, 206。详见李安山:《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以非洲为例》,第76—97页。

③ 可儿弘明、罗晃潮:《近代中国的“猪仔”和“猪花”》,《东南亚研究》1981年第4期;罗晃潮:《“猪花”浅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有关“猪花”,还可参见〔日〕可儿弘明:《猪花:被贩卖海外的妇女》,孙国群、赵宗颜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 “Extract from 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the Colonial Land Emigration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Dated 2nd May, 1854 Relative to the Problem of Feminine Emigration from China,” Report sent to the Governor of Mauritius by the Duke of Newcastle, Mauritius Archives SA 51/126, 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p. 357-359.

漂泊在外,生活无着落,华工不愿意家人跟着受苦,只好暂别妻儿。当时清朝政府也有相关规定,禁止女性离开国土。这样,限制女性移民的直接后果是早期华侨社会中存在着男性与女性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表 10 表明了毛里求斯华人中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现象。

表 10 毛里求斯华人口统计表(1850—1911)

年份	男人	女人	合计
1850	586		586
1851	1086		1086
1861	1550	2	1552
1871	2284	3	2287
1881	3549	9	3558
1891	3142	9	3151
1901	3457	58	3515
1911	3313	349	3662

资料来源:《毛里求斯华人简史》(毛里求斯《周末报》专题文章),刘新莽译,参见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 51 页。

实际上,在其他欧洲殖民地也存在同样问题。以西印度洋的塞舌尔为例。1891 年人口调查表明,华人移民有 45 人,其中男性为 44 人,女性为 1 人。1901 年,华人增至 110 人,其中男性为 108 人,女性为 2 人。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逐渐改变。1931 年的人口统计表明,335 名华人在塞舌尔定居,其中 197 人为男性,138 人为女性。^①

第一批中国移民妇女于 1864 年来到留尼汪,然而,这些妇女的到来丝毫未改变性别比例上的悬殊。从表 13 可以看出,留尼汪华人男女的比例悬殊。1864 年华人总人口为 977 人,女人只有 10 人;1871 年华人有 1179 人,女子只有 15 人;1902 年华人共有 1378 人,女人只有 28 人。岛上中国妇女的稀少,由于路途遥远男人又不能随便回家结婚,加上男人的生理需求,还有传宗接代的需要,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异族通婚变得相对普遍。^②

在非洲其他地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人中男人与女人的比例

^① Census Reports Seychelles. 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126.

^② Dadoun G., s. l. n. d. Edith Wong-Hee-Kam, *La Draspu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 Le Cas de la Reunion*, p. 93.

仍然存在着失衡,比率大约为2:1。表11是国民政府驻南非总领事馆在1946年进行的一次非洲地区华人人口统计。

表11 民国驻南非总领事馆所辖部分区域人口统计(1946年)

殖民地名称	辖区名	城市名*	男人	女人	男童	女童	合计
	南非联邦	约翰内斯堡	485	281	374	327	1467
		比勒陀利亚	116	61	95	91	363
		德班	31	18	19	20	88
		开普敦	66	32	66	59	223
		东伦敦	48	34	78	59	219
		金伯利	42	26	47	37	152
		伊丽莎白港	244	187	285	244	960
葡属东非	莫桑比克	贝拉	335	103	182	147	767
		洛伦索-马贵斯	193	92	152	138	575
英属东非	肯尼亚	蒙巴萨	29	12	18	13	72
		内罗毕	43	12	17	11	83
	坦噶尼喀	达累斯萨拉姆	28	5	17	6	56
英属中非	南罗得西亚	布罗瓦约	23	10	28	21	82
		索尔兹伯里	26	7	15	13	61

资料来源:〔南非〕《侨声报》1946年1月15日。

* 原来的旧译名均已改为正规译名。

从表11中可以明显看出,男女比例仍然较为悬殊。无论是在人多的城市,抑或人少的地方,男性总比女性多出不少。最突出的是葡属东非,贝拉港的华人中男性是女性的三倍;其次是洛伦索-马贵斯,男性达到女性的两倍;在南非,开普敦和比勒陀利亚的情况相对比较突出,男性华人基本上是女性的两倍。然而,从华裔的比例来看,已基本达到平衡。

(二) 战后华人男女比例趋于平衡

随着华人人口的增加,华裔的出生及混血家庭的出现,华人的男女比例渐趋平衡。从表15可以看出,在1944—1952年这短短八年中,毛里求斯的华人增加了近7000人。与此同时,女人在华人人口的比例从29%提高到37%,这无疑对一个移民社区能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1952—1962年,华人新移民共有5000多人,这些数据也印证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华人移民高潮期。然而,女人在华人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持续上升,1962年达到41.5%,1970年达44%,1972年下降0.3%,仍保持在43.7%的水平。可以说,到20世纪70年

代,男女比例已不再是一个影响华人社会稳定的因素。^①

同样情况发生在马达加斯加。在 1941—1953 年间,共有 321 名华侨进入马达加斯加,这些移民主要是以妻子和亲戚的身份。1951 年,4900 名华侨中男性 3466 名,女性 1434 名,约占华侨人口总数的 29.4%。1967 年,马达加斯加人口统计表明,9069 名华侨中男性 5052 人,女性 4017 人,女性已占华侨总数的 44.3%,比例已趋于平衡。如果考虑年龄因素,这一比例仍欠平衡,因为 21 岁以上的女性只占 38.5%,14 岁以下的女性占总数的 48.4%。^② 根据马达加斯加的官方统计,1975 年华侨男女人数分别为 2397 和 1642。从中可以看出,华人在 1975 年的男女比例虽然在有的地区(如菲亚纳南楚阿)还比较悬殊,但基本上较平衡,这种情况比起 20 世纪初好多了。原来马达加斯加华人中的男女比例相差甚远,1904 年,马达加斯加的 446 名华侨中,只有三名女性。^③ 与其他的地区一样,这种早期男女比例失衡导致了大批混血华裔的出现。

(三) 混血家庭与克里奥尔华裔的出现

男女比例失衡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部分男华侨与当地妇女、其他移民(白人或印度人)或克里奥尔妇女通婚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混血华裔的出现。当然,这种以华人父系为主的混血家庭的出现除性别比例失衡和生理需求外,还存在其他社会原因。在经济上,这种混血家庭为经商的华人店铺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资本,更便捷的销售(或进货)渠道,并保证了更稳固的顾客群体。在法国殖民地(如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对华人或外籍人经商有各种歧视政策,规避这些政策的一个变通办法是与当地女子结婚。马达加斯加独立后,对外籍人拥有土地和房产仍有严格规定,混血家庭则可享受公民待遇。^④ 政治因素有时也在考虑之列。不少混血的华裔已在参与当地政治,如在总理办公室任职的潘伟喜、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陆社恒、马达加斯加工贸部顾问陈威廉等。^⑤

在马达加斯加,华人男性与当地的马尔加什女性结合的事时有发生。当地的人口登记习惯往往将父系为华人的混血儿作为马尔加什人记入档

^① 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114. 这些数字与毛里求斯《周末报》上的文章里的数字有出入。参见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 51 页。此外,1957,1961 和 1970 年的数据来自相对应年份的《华侨经济年鉴》。

^② Slaweck,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pp. 52, 57.

^③ *Ibid.*, p. 52.

^④ 笔者于 2016 年 12 月在毛里求斯参加国际研讨会时,会议举办方专门从马达加斯加请来一位中国厨师。他是连云港人,目前已在马达加斯加定居,妻子是一位马尔加什人,两人和睦相处,还生了一位混血男孩。

^⑤ 王奕华:《马达加斯加的混血华裔》,在吕伟雄主编:《海外华人社会新透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

案,因此,要查清混血儿的确切人数很难。1954年,马达加斯加一次非正式的人口调查表明:华人-马尔加什人“非正常”结合的共有1111对,正常结合即合法婚姻的有125对。这种情况加上混血儿得到生父及华人社团的认可,在马达加斯加社会存在着数量可观的混血华裔。一位在马达加斯加工作的操广东话的法国神甫估计,1957年,华人-马尔加什人混血儿达5000人。如果按一般的人口规律统计,1969年,华裔中应有近1万名是混血儿。^① 根据目前的非官方统计,马达加斯加有5万华人(包括老侨和新侨),而混血华裔达30万人,两者相加已占马达加斯加1700万人口的2%。在塔马塔夫省和有着“金三角”之称的桑巴瓦、安塔拉和安塔拉哈地区,由于历史上契约华工和抵达马达加斯加的华人多在这些地区集中,因此,居住着大量的混血华裔。^②

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南非,华人与白人或其他人种的结合也不时在发生。一位约翰内斯堡的神甫米歇尔·图奥希(Micheal Tuohy)坦承,他曾主持过19对华人与白人的婚礼:“我的态度是你无法阻止人们跨越种族界线坠入爱河,他们有结婚的天赋权利。并非国家可以决定谁可以结婚谁不可以结婚。……这些人是天主教徒,他们有进天主教堂举行仪式的权利。……我刚开始为他们主持婚礼时还真有些紧张,担心一旦被发现,我可能因此失去主婚的资格执照,甚至可能被驱逐出境。在大约1968年刚开始的那会儿,有些婚礼是偷偷进行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这颇为荒谬,便公开主持婚礼。这并非什么故作英勇的行为或是为了蔑视谁。我的良心告诉我,这些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在上帝面前结合到一起。”^③留尼汪华人历史上也记载着不少这种华人-克里奥人混血家庭的例子。^④

五、华侨的国籍选择与身份认同

华侨华人人口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在传统的华人移民目的地,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人逐渐减少。在1950—1960年代,“叶落归根”的观念仍存在。当时,在中国出生的华人不少,大部分华人在家里说汉语。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

① Slawewc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pp. 60-61.

② 王奕华:《马达加斯加的混血华裔》,第33页。

③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368.

④ 多米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492—493页;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北京:飞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98—100页。

是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侨务政策的改变(特别是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及居留国移民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华人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种身份选择往往直接影响到华人在居留国的生活条件(就业、入学和税收),这种身份认同的现实表现是选择国籍的问题。由于居留国入籍多实行出生地原则,出生在居留国的华裔全部成为当地公民。同时,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与世界其他地区处于隔绝状态,很少有人移民国外,这样,非洲华人中保留中国国籍的日益减少。

华人一直是毛里求斯的少数民族,占总人数比例很小。由于印度和毛里求斯原来均为英国殖民地,在殖民统治期间,印度人迁移到毛里求斯相当于在英帝国范围内的移民,因此,印度人在毛里求斯人口比例相当大,一直保持在60%—70%,而华人往往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

1944年印度-毛里求斯人为26.5247万人,1952年增加7万余人,达33.5327万;1962年又增加了近12万人,达45.4909万人。从1944—1962年,印度-毛里求斯人的人数增加了约19万人,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独立及随后印巴分治带来的动荡明显相关。华侨的增长速度有相近之处。在1944年以前的30年里,每10年的增长数约为2000—3000人。然而,在1944—1952年的八年时间里,华人人数增长了近7000人,在接下来的10年里,华人再增长5000多人。^①这种情况与中国国内的局势密切相关,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国向海外包括毛里求斯的移民有所增加。

表 12 毛里求斯华人的国籍(1952)

	男人	女人
英国国籍(出生)	6501	6018
英国国籍(婚姻)		80
英国国籍(入籍)	861	261
中国国籍	3042	1060

资料来源:MA Census Report, 1952. Marina Carter & James Ng Foong Kwong, *Abacus and Mah Jong*, p. 131.

1944年,毛里求斯华侨为1.0882万人,其中保留中国国籍的占42.44%。1952年,毛里求斯仍为英国殖民地,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已有1.2519万人,加上申请入英国籍的华人1122人,英国籍华人已达1.3641万人,保留中国国籍的只有4102人,不到30%。1962年,华侨总数达1.2178万人,保留中国国

^① 奥古斯特·图森:《马斯克林群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98页。

籍的降至 15.32%。主要原因是华人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加入英国籍并进入行政机构,成为公职人员。^①

表 13 马达加斯加华人入籍情况(1970—1980)

年份	华侨入籍人数	华侨妇女入籍人数 (与马尔加什人结婚)
1970	14	6
1971	15	2
1972	0	6
1973	0	2
1974	0	3
1975	1	4
1976	1	0
1977	8	0
1978	1	3
1979	2	0
1980	6	2
总计	48	28

资料来源:方积根、李秀华:《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第 83—84 页。

1949年后,从中国移民到马达加斯加的华侨华人有所增加。1951年,马达加斯加的华侨华人共有 4900 人,1961 年,华侨华人已达 8900 人。十年内人数增加了 4000 人。这种人数的增加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自然增长率所然,二是从国内迁移过去的,或是为了继承遗产,或是投亲靠友,或是为了找职业。^② 后来,由于局势动荡,华侨人数也一度减少。然而,马达加斯加入籍的华人的数量一度保持在较低水平。

表 14 南非华人出生于中国、说汉语人数统计表

	1936	1946	1951	1960
出生于中国	1648	1878	2108	1755
在家说汉语	2332		4738	4831

资料来源:参见 Linda human, *The Chines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Freewheeling on the Fringe*,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1984, p. 36。

① 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103. 该处数字与该书另一处数字有差异。1944 年华人人口的另一数字 6808, 1962 年的华人人口数为 1.2654 万。参见上引书, Table V, p. 164, 还可参见 Marina Carter and James Ng Foong Kwong, *Abacus and Mah Jong: Sino-Mauritia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9, p. 131。

② 方积根、李秀华:《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 75 页。

以上统计表明,当时在南非定居的华侨仍力图保持中国人身份。虽然出生在中国的人数不多,但他们坚持在家说中文。1936年,南非华人中有1648人出生在中国,但在家说中文的为2332人,远远多于中国出生者。1966年,这种局面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所加强,出生在中国的人为1755人,而在家说汉语的达4831人。移民南非的华人在种族隔离制后期开始增加,主要与南非政府的宽松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政策鼓励华商移民南非。从1976—1979年,抵达南非共和国的台湾移民只有12人,在1980年—1989年间,移民南非的台湾人达935人。1990年一年内,1422名南非华人移民全都是从台湾去的。至于到南非做生意的台湾人,则数目更大。由于台湾采取承认双重籍贯的政策,台商移民南非无所顾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华人移民南非的逐渐增多,但申请成为南非公民并获批的华人很少。1985—1995年间,仅7795名中国人获得南非国籍。^①

长期以来,留尼汪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地,1946年成为法国的海外省。从历史上看,华人人数一度远比印度人多,直到1954年,华人仍然是印度人的三倍。目前,华人中超过90%的都是华裔。华人多选择法国国籍,虽然一些老华侨一直保留中国国籍,但人数日益减少。这种选择与法国对严格限制外国人经营相关行业和领域有着直接关系。^②

表15 留尼汪华人保留中国国籍人数变化表(1926—1981)

年份	保留中国国籍人数	年份	保留中国国籍人数
1926	1629	1954	2820
1931	2242	1961	1967
1936	2854	1967	954
1941	3835	1972	850
1946	1910	1973	820
1947	2500	1981	430

资料来源:多米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505页。

从表15看,1926—1941年,保留中国国籍的人是持续增加,这表明中国移民的人数持续增加。1926年,留尼汪的华侨人口为1626人,1929年为1988人,随

^①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10.

^②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5年版,第26—27页,77页。

后不断递增,以1941年为3853人。然而,1946年的华侨人数突然减至1910人,随后又逐渐增加,直至1954年以后就逐年减少,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内战引起留尼汪华侨的极度失望,打消了他们叶落归根的期盼。同时,1946年留尼汪成为法国的海外省以后,法国将原宗主国实施的各种法令都引进留尼汪。“最有助于把华人固定在留尼汪的税法,是阻止资本外流法。它迫使华人把积蓄的钱,进行就地地产投资。”1950年,明令禁止外国人入境,对已在岛上的外籍人士严格管理,禁止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出生在留尼汪的华人移民,逐渐收紧了对外籍人士的管理。1952年2月13日,法令规定免收投资盈利税。华人因为投资地产,成为重要的不动产主,他们中甚至用经商赚来的钱在法国投资地产,其社会地位也因之大大提升。可想而知,如果光靠经商,他们不可能得到这种地位。^①

留尼汪与法国本土一样,相当多的行业和领域不许外国人涉足,如保险、报关、私家侦探、代办移民业务、银行业、货币兑换、军火制造与买卖、金业、珠宝业、船舶代理、戏院、公共运输、无线电制造与买卖、民用测量、旅馆与音乐厅、印刷业、船舶燃料供应、注册事务等。一旦成为法国公民后,他们可以经营以前不许涉足的各个领域。华侨在从事贸易的同时,多获得酒类经营的牌照。后来,法国政府发出禁令,对于已领有零售酒类牌照的华侨,在其去世或离境后,子女不得继续经营此项业务。这一限制对华侨的影响相当大。从1950年以来,法国政府开始对外籍人员征收商业证特别税,每两年为一期,每期换取商业证,其征收税款递增。第一期征收360元,第二期征收2400元,第三期征收3400元,第四期征收3600元。^②华侨对此项税款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华侨多以经商为业,对这样高的税收难以承担,加之增率过高,实有不胜负荷之苦。获得法国国籍之后所有这些得以免除。

一方面是对外籍人的严格控制和各种禁令,另一方面是对入籍者的种种宽松条件,从而导致大部分华人申请法国籍,保留中国国籍人数减少。1962—1980年,在1192人入籍者中,526位是中国人,其中2/3是商人。1979—1980年,74位被接纳入籍的中国人大部分是20世纪30年代来留尼汪的广东人。他们为什么要加入法国籍呢?首先是非常实用的考虑。这些人并不会讲法语,更不具备书写法文的能力。然而,取得法国国籍后,他们得以享受多项以前不曾享有的权利,包括个人旅行、子女上学,缴纳税款等方面,待遇从优,特别在经济方面。研究留尼汪华侨史的作者认为,这里的华人往往自认为自己

^① Huguett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151.

^② 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58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58年版,第725页。原文如此,货币单位似应为法郎。

具备三个身份：中国人、留尼汪人和法国人。“感到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父辈与祖父辈出生在中国，因为他们在那里还有主要亲戚，因为他们信奉中国传统的道德与宗教。感到是留尼汪人，因为他们的孩子出生在留尼汪，在那里学习，讲当地语言，在那里生活，采纳当地风俗，并且融合了来岛建设的人民的各种风俗习惯。感到是法国人，因为他们获得了法国毕业证书，书写用的是法国语言，结婚仪式是法国式的，所接受与投票表决的法律是法国的法律。”^①

实际上，相当部分的华人认为自己是留尼汪人，也包括他们中的另一个身份：克里奥尔人。正如吴玉莲指出的：“比起法国人或中国人，我更愿意说自己是克里奥尔人。”^②

留尼汪华人只是非洲华侨的缩影。实际上，非洲甚至海外华人往往趋向于多重身份的认同。对于那些长期在国外定居入籍的华人而言，他们的政治身份无疑以当地国籍而论，特别是1958年中国放弃承认双重国籍以后。然而，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却往往倾向于中国。

结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非洲华人的增长成为一种常态，在华人人口变化方面有三种表现：这一时期出现了华侨华人增长的三次小高潮，华侨华人的性别比例逐渐平衡，老一辈华人中持有中国国籍者日益减少。

20世纪50—60年代有一个移民小高潮，这在马达加斯加、留尼汪、毛里求斯、葡属东非等地均如此。20世纪70—80年代，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移民非洲的人数开始增加，香港移民迁入南非、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家，这是第二次高潮。20世纪90年代起是第三次高潮，除了从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移民非洲外，大陆的移民开始涌向非洲。

华侨华人男女性别比例逐渐趋于平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另一个特点。以前由于性别比例差异过于悬殊而出现混血家庭，克里奥尔华裔人数增多，这一现象逐渐减少。由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老一辈华人中持有中国国籍的人日益减少，这是这一时期的第三个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主要是指老侨集中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如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这是因为非洲各国的国籍政策大多采取出生地政策，日益增多的华裔理所当然地成

① 多米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505、509页。

② 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第98页。

为当地人。然而,他们始终保持着政治(居留国)与文化(中国)的双重认同。在非洲其他国家,新移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态,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都保持着中国国籍。

另外,从1995—2015年的20年里,中国移民非洲的日益增多。这种移民非洲的势头主要有以下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广大民众移民海外的积极性,他们希望了解这个充满神奇感的大陆。中国企事业单位的改制使得相当大的一批人陷入困境,或是将他们彻底解放出来,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创业机会。同时,中国企业也将目光伸向非洲,非洲国家也在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和投资者,它们对外来移民和投资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西方提高了对移民的各种条件,进一步加强了审批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移民非洲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近两年来,非洲华侨华人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即一些华侨返回或再迁移,其原因在于男性移民需要成家、赚了钱无人继承开始思乡、子女教育、经济不景气、社会治安不理想、部分非洲国家货币贬值使生意难做,以及一些国家的签证开始收紧,等等。^①以安哥拉为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安哥拉的中国移民在2015年经济困境后大量回国,中国人数量下降了40%—50%,而且在继续下降,^②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地。在毛里求斯,大量华裔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直接在国外找到工作,致使毛里求斯华人人数大量减少,目前人数由原来的三万减少到1.8万。^③

最近几年出现的中国人从非洲回流的现象引发了学者的讨论。有学者据此认为,“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不会继续增加,而会在目前的数量上略有减少”。^④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不同看法。尽管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中国移民返回中国的现象也确实存在,最近非洲一些国家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移民的收入,回流现象相对明显。然而,中非经济关系的基础有望从贸易转到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多方位的合作。中非产能合作基础上的投资加强,中非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的促进,大部分非洲国家仍愿以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外资。从各种迹象看,非洲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仍会持续增加。^⑤

① 陈肖英:《南非中国新移民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28—35页;李新烽:《非洲华侨华人数量研究》,第7—12页。

② 2017年1月25日,卡罗斯·奥亚致笔者的电子邮件。

③ 2017年1月25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沙伯力(Barry Sautman)致卡罗斯·奥亚的电子邮件。

④ 李新烽:《非洲华侨华人数量研究》,第11—12页。

⑤ 李安山:《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以非洲为例》,第76—97页。